

精准扶贫视域下云南省易地搬迁农户的 就业能力评价研究

王璐 张春丽 王璐 任薇薇¹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本文基于云南4个易地搬迁安置点的241户搬迁农户的微观数据,从生计恢复力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云南省农村易地转移农民就业能力评估量表,并使用了组合赋权的因子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表示:影响云南省易地转移农民就业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信息素质、人力资源、职业认同、社会适应能力,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基于此,云南省扶贫办应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以增强易地搬迁农户的就业竞争能力。

【关键词】: 易地搬迁 就业能力 生计恢复力 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1 问题的提出

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战全面收官后的第一年,“十三五”期间提出的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案有效地缓解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农村地区近一亿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为打赢全国脱贫攻坚战、完成下一次总体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国内学者王琳(2018)指出由于部分移民脱贫基础不牢、内在动力不足,存在生计脆弱性和返贫风险性,导致未来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仍有可能存在。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的最新统计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已经脱贫的人口中还有将近二百万人面临回贫风险,而脱贫边缘人口中则有将近三百万人面临致贫风险。鲁明月(2020)和曾小溪等(2019)分别指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大体存在后续产业支撑力度不足、搬迁后收入未增加等现实问题,同时张涛等(2020)认为产业发展和就业安置应与搬迁户实际情况相结合。从上述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就业减贫已成为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紧要任务。汪磊等(2020)要从搬迁农户的从业能力入手,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优惠政策,才能真正地从政策层面提高就业扶持政策的精准性。

英国学者Beveridge(1944)第一次提出了就业能力这个概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Law等(1996)从个体适应性、个人与市场的交互作用以及职业认同感这三个维度来定义就业能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部分学者对就业能力展开研究,但大多数的研究对象都聚焦于大学毕业生这一群体,以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研究易地搬迁农户就业能力的研究文献更是罕见。

综上所述,易地搬迁农户属于中国国家在精准扶贫战略进程中产生的一个新兴人群,该人群不仅无异于中国传统的农民工群体,而且也与普通的农业困难户不同,其就业机会力量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影响其就业机会力量的各种因素也亟待深入分

¹**作者简介:** 王璐(2001-),云南昭通市人,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学;张春丽(2000-),云南昆明市人,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经济学;王璐(2000-),云南玉溪市人,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经济学。任薇薇(1975-),云南昆明市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基金项目: 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精准扶贫视域下云南省易地搬迁农户的就业能力评价研究”(编号:202010681053)资助

析。除此之外，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偏重于定性描述易地扶贫搬迁中农民的就业机会状况，较少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试图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来评估易地扶贫搬迁中农民的就业潜力，其现实意义至关重要。

2 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为了使评价体系能综合评价易地搬迁农户的就业能力，本文基于 Chinwe 的生计恢复力理论和邹瑜(2020)构建的搬迁农户就业影响因素生机恢复力框架，从以下三个层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一是内部缓冲力，即搬迁农户基于各类资本采取不同策略以抵抗搬迁后环境改变带来的外部冲击；二是外部组织能力，即搬迁农户利用社会交际重新塑造社会恢复力。三是技能学习能力，是指搬迁农户获取知识技能并将其转换为行动的能力。根据以上三个维度，本文构建的评价指标包括： X_1 (教育情况)、 X_2 (劳动能力)、 X_3 (身体情况)、 X_4 (工作经历)、 X_5 (工作年限)、 X_6 (从业信息关注度)、 X_7 (从业培训情况)、 X_8 (利用就业资讯找工作)、 X_9 (工作环境适应度)、 X_{10} (非农就业模式适应度)、 X_{11} (工作收入满意度)、 X_{12} (工作内容满意度)。

3 基于组合赋权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评价

3.1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课题组自 2021 年 1 月至 4 月在昭通市靖安新区、卯家湾安置区、玉溪市甸苴社区、昆明市新哨新村 4 个易地搬迁社区开展的实地调研。累计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269 份，获取 241 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 118 人，女性 123 人，分别占总数的 48.96%和 51.04%。

问卷主要包括易地搬迁户的基本信息、从业状况、职业技术掌握和培养状况以及搬迁户职业能力的自我评价表。有效问卷主要利用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计算。

3.2 数据的信效度检验

将数据输入 SPSS 管理软件后得到结论，如表一显示。表中 $KMO=0.900$ 等于经验值零点六，而 Bartlett 球度试验的显著性水平则是零，并否定“指数关系互相独立性”的原假定，这就意味着本文中所选择的十二个指数最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1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00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879.081
	自由度	66
	显著性	0.000

3.3 因子分析

3.3.1 计算矩阵 R 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需要提取四个公共因子，公共因子提取及解释信息比例情况如表 2 所示。经因子分析后，以损失了原始信息量的 35.299%的代价，成功地使原来的十二个指标降低至四个指数，从而完成了对高维数据的降维。

3.3.2 因子命名

提炼的公共因子 F_1 经旋转后在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等 5 个指标上具有高载荷，这 5 个指标都集中农户的教育情况、劳动能力、身体素质等方面，充分反映了该农户的人力资本概况，不妨将 F_1 概括为“人力资本因子”；公共因子 F_2 在 X_6 、 X_7 、 X_8 等 3 个指标上具有高载荷，这 3 个指标主要集中在就业信息方面，不妨将 F_2 概括为“信息素养因子”；公共因子 F_3 在 X_9 、 X_{10} 、 X_9 、 X_{10} 等 4 个指标上具有高载荷，这 4 个指标集中反映了农户对工作环境、就业模式及用工单位的适应性，不妨将 F_3 概括为“适应能力因子”；公共因子 F_4 在 X_{11} 、 X_{12} 等 2 个指标上具有高载荷，反映了农户对工作内容、工作收入的满意度，不妨将 F_4 概括为“就业认同因子”。

3.3.3 组合赋权

从客观评价的视角出发，因子分析虽然是相对客观的评估方式，但实质上这些权重都是由公共因子本身的方差贡献率所确定的。由分析结果可知， F_1 、 F_2 、 F_3 、 F_4 的方差贡献率分别是 40.545%、8.62%、8.018%、7.519%，以上 4 个方差贡献率的和为 64.701%，得到 4 个公共因子的权重分别为： $W_{F1-客观}=62.66\%$ ， $W_{F2-客观}=13.32\%$ ， $W_{F3-客观}=12.39\%$ ， $W_{F4-客观}=11.62\%$ 。由于客观赋权存在不足，需要借助主观赋权弥补这些缺陷。

因此，本文尝试引入德尔菲法，邀请云南省扶贫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驻村第一书记及云南师范大学从事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的 8 位专家，充分利用专家的个人经验和知识结构，本着科学、客观的原则，先后进行四轮匿名咨询，最后取各位专家权重赋值的中位数，得到 F_1 、 F_2 、 F_3 、 F_4 的组合权重， $W_{F1-主观}=28\%$ ， $W_{F2-主观}=30\%$ ， $W_{F3-主观}=16\%$ ， $W_{F4-主观}=17\%$ 。显然，主观赋权的专家认为信息素养因子 F_2 是影响搬迁农户就业能力最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是人力资本因子 F_1 。

由于因子分析的客观赋权单靠数据决定，不受人为因素干扰，而德尔菲法依靠专家的知识结构和个人经验，两类方法均具有其合理性，二者的组合应用可以弥补单一客观赋权的缺陷，提高赋权的精准度，故组合权重取二者的平均值，即 $W_{组合} = \alpha \times W_{客观} + (1-\alpha) \times W_{主观}$ ， α 代表组合系数，这里取 $\alpha = 0.5$ ，组合赋权后， F_1 、 F_2 、 F_3 、 F_4 、 F_5 的权重分别变为： $W_{F1-组合}=41.57\%$ ， $W_{F2-组合}=22.68\%$ ， $W_{F3-组合}=17.32\%$ ， $W_{F4-组合}=14.92\%$ 。如表 4 所示，组合赋权后不同指标之间的权重差异相对缩小，较原来单一的赋权结果起到了修正的作用。

表 2 公共因子提取及解释信息比例情况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4.865	40.545	40.545	4.865	40.545	40.545	2.383	19.857	19.857
2	1.034	8.620	49.165	1.034	8.620	49.165	2.150	17.917	37.774
3	0.962	8.018	57.183	0.962	8.018	57.183	1.708	14.236	52.011
4	0.902	7.519	64.701	0.902	7.519	64.701	1.523	12.691	64.701
5	0.697	5.805	70.507						

6	0.639	5.328	75.835						
7	0.565	4.711	80.545						
8	0.523	4.359	84.905						
9	0.510	4.254	89.158						
10	0.469	3.906	93.064						
11	0.434	3.613	96.677						
12	0.399	3.323	100.000						

表 4 公因子的组合赋权

	F ₁	F ₂	F ₃	F ₄
客观权重	40.545%	8.62%	8.018%	7.519%
主观权重	28%	30%	16%	17%
组合权重	41.57%	22.68%	17.32%	14.92%

3.3.4 计算各安置点搬迁农户就业能力得分 F 及综合排名

将上述组合权重 $W_{F_1\text{-组合}}=45.33\%$, $W_{F_2\text{-组合}}=21.66\%$, $W_{F_3\text{-组合}}=16.20\%$, $W_{F_4\text{-组合}}=16.81\%$, 带入下列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即可得到各安置点的综合得分 F, 按照因子分析得到 F₁、F₂、F₃、F₄ 的得分及各安置点 F 得分值。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中各系数可以得到各公共因子由原始变量表示的表达式, 如下所示:

$$F_1 = -0.20236x_1 - 0.68165x_2 + \dots + 0.96859x_{241}$$

$$F_2 = -1.24981x_1 + 0.20625x_2 + \dots + 1.09481x_{241}$$

$$F_3 = -0.20236x_1 - 1.17741x_2 + \dots + 1.36503x_{241}$$

$$F_4 = -0.20236x_1 + 1.55739x_2 + \dots + 0.22702x_{241}$$

依据上述函数表达式, 可以计算出搬迁农户的各项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综合得分表达式如下:

$$F = 45.33\% \times F_1 + 21.66\% \times F_2 + 16.20\% \times F_3 + 16.81\% \times F_4。$$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 4 个安置点的得分 (D_i 表示第 i 个安置点, F_{D_i} 代表地 i 个安置点搬迁农户就业能力综合得分), 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序: (1) F_{D3}=3.80; (2) F_{D1}=2.34; (3) F_{D4}=1.74; (4) F_{D2}=1.24。

3.3.5 内涵分析

据得分结果分析,本文所选择的四个易地转移安置点农民的就业能力普遍较差,其中最高分为 $F_{03}=3.80$,即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新区安置点,最低分为 $F_{10}=1.24$,即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道甸直社区白土村。由描述性分析显示,靖安新区58.67%的易地搬迁农户为高中文化水平,而白土村易地搬迁农户中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占比仅为16.675%。同时,靖安新区的 F_1 因子得分最高,白土村的 F_1 因子得分最低。由此可知,人力资本因子 F_1 是影响搬迁农户就业能力最重要的因素。

从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在易地搬迁农户脱贫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石钰炜等(2021)运用了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出人力资本是加剧搬迁后农户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程名望等(2016)发现,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劳动收入来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其中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的核心变量。程名望等(2015)认为,劳动者的人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与劳动者健康评价优良比例,可以减少中、低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所以,要注意易地搬迁社区的人力资源积累。

4 结论和建议

论文以云南省内四个易地扶贫转移安置点的农民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社会综合赋权的因子分析法,提炼出了直接影响转移农民就职工作能力的四个重要社会公共基本因子,即人力资源、信息素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职业认同。调查结果显示,人力资源因素对易地搬迁农民就业能力的负面影响较大,而职业认同因素对非农就业能力的负面影响最小,而云南省内易地搬迁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则一般较低。鉴于此,云南省应加大对易地搬迁户人力资本口的支持力度,提高了教育和医疗保险的可获得性,以避免因资源配置不均等所造成的社会投入不均衡,缩小人力资本差异与薪酬差别。短期来说,改善非农人口就业能力,建立健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以提高社区村民的健康状况;从长远来说,政府应保证易地迁建社区九年义务教育的质量,使每位迁移农民的子女均受完义务教育,同时,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和职业教育,以提升新转移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产能力,增强其就业竞争力。通过卫生文化传播,提高贫困人口的卫生意识,确保搬迁农民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 [1]王琳.中国扶贫开发的理论演进、实践发展与思路创新[J].宏观经济研究,2018(01).
- [2]鲁明月.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问题及应对路径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20(2).
- [3]曾小溪,汪三贵.打赢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攻坚战的若干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4]张涛,张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减贫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 [5]汪磊,汪霞.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就业能力评价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3).
- [6]BEVERIDGE W H.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M].London:Geoprge Allen&Unwin,1944.
- [7]LAW K S,WONG C S,MOBLEY W.Toward a Taxonomy of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4).
- [8]石钰炜,刘逸凡,马雯慧.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人力资本对移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浙江农业科学,2021(2).

[9]程名望, 盖庆恩, Jin Yanhong, 等.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 2016(1).

[10]程名望, 史清华, Jin Yanhong, 等. 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 模型与实证[J]. 管理世界, 2015(7).